

隐逸与坚守：论阿城“三王”系列小说的叙事艺术与象征意蕴

刘瑞雪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兰州市，730070；

摘要：阿城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三王”系列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以独特的叙事艺术和深刻的象征意蕴，建构了一个融合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文化世界。本文通过分析阿城的知青经历与创作背景，探讨其小说中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展示性叙事”的独特运用，揭示其朦胧多义的美学追求。在象征层面，《棋王》通过“饥饿叙事”展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塑造了在乱世中坚守棋道的理想人格；《树王》以树与人的共生关系，隐喻极左思潮对自然与人文的摧残；《孩子王》则通过字典与教育的符号化表达，呼唤文化传承的迫切性。阿城在边缘群体身上寄托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理想人格，其小说既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反思，也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追寻，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与禅意境界，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范式。

关键词：阿城；“三王”系列；寻根文学；叙事艺术；象征意蕴

DOI：10.64216/3080-1494.25.03.029

阿城（1949— ），本名钟阿城，生于北京，祖籍重庆江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以《棋王》《树王》《孩子王》组成的“三王”系列小说，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这些作品不仅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江湖，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新时期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阿城笔下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双重特质：他们既是深谙传统之道的隐士，淡泊名利而身怀绝技；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个体，彰显着自由不羁的精神品格。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形成了阿城小说独特的审美特质。他以文学的方式探讨宇宙、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展现出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层面，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结构和文学理念。在“三王”系列中，阿城通过对平凡生活的诗意书写，营造一个朦胧而不失深邃的艺术世界。他以禅宗式的智慧，引领读者超越表象，以直觉感悟生命真谛，体味时空之美与存在之思。本文将《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经典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阿城独特的文学创作理念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试图揭示阿城如何以其独特的艺术方式，完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诠释。

1 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导致

阿城的求学道路被迫中止。由于健康状况欠佳难以承担高强度体力劳动，他被分配到教育岗位。出身于文化世家的阿城自幼博览群书，这份能够施展其学识的工作令他倍感珍惜，他倾尽全力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为学生们开拓视野。初到农村时，阿城仍难逃被孤立的处境，当地农民对他持排斥态度。从山西辗转至内蒙古，最终落户云南，经过多次迁徙后终于在云南安定下来。原计划三年的插队生活不断延长，最终持续了整整十年。直至1978年，他才得以通过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返乡，加之父亲政治问题的平反，最终回到北京。

长达十余年的农村生活将阿城置于一个广袤而质朴的原始社会环境中。在插队岁月里，他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与农民共同关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夜晚时分，只需一盏煤油灯、一杯清茶，就能吸引众多村民围坐聆听他讲述故事。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为阿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使其作品既扎根于知青生活体验，又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常规表达。在他的笔下，知青生活虽充满艰辛，却洋溢着乐观精神，甚至呈现出某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情调，展现了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即便返城后，他仍然执着于探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命题——温饱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从政治反思转向文化寻根。在这场文学运动中，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各自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其中，阿城凭借《棋王》《树王》《孩子王》等作品崭露头角，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在

政治洪流中坚守精神追求的底层人物形象。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文化自觉,使阿城当之无愧地成为寻根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

2 阿城小说的叙事艺术

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体裁,小说的本质功能在于通过艺术化的故事叙述传递生命体验并实现与读者的情感共鸣。浦安迪给叙事文下了一个简易的定义:“叙事文是一种能以较大的单元容量传达时间流中人生经验的文学体式或类型。”^[1]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的建构者,往往具备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感知能力和深刻的思想认识,这使得他们的人生经验较之常人更具深度与启示意义。文学史上,托尔斯泰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其“勿以暴力抗恶”的人道主义思想;鲁迅则通过农民与知识分子题材深刻探讨反封建主题与中国革命道路。阿城在其“三王”系列中同样寄托了独特的人格理想,通过叙事传递其生命体悟,这些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恒定的精神内核:在物质生活上应淡泊自守、随遇而安,但在精神追求上却要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评述《棋王》时指出:“它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我们要从困苦、纷扰、动荡的生活中超脱出来,进入一种精神境界。阿城正是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将其知青岁月积累的深厚生活体验与叙事才能完美结合。”^[2]

在叙事策略上,阿城的“三王”系列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展示型叙事模式与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运用。这种叙事选择与其创作理念密切相关。正如阿城在与施叔青的对话中所言:“主题是枯燥的。状态相对于语言而言是非逻辑性的...若主题过于清晰,小说就会失去生命力”。^[3]因此,阿城有意通过模糊化的叙事方式保持文本的开放性。在《棋王》等作品中,叙述者“我”仅客观呈现所见所闻,而不作主观评判,这种克制叙事使得作品主题呈现出朦胧性与多义性特征。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对此类叙事方式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展示型叙事呈现的往往是反映者意识中的零散印象...这些未经理性整理的印象之间存在着大量意义空白,需要读者主动填补,从而形成文本的不确定性”。^[4]

值得注意的是,阿城对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具有深刻的创作自觉。返京后的边缘处境与人生挫折,促使他寻求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多种艺术形式中,阿城最终选择小说并融入其绘画艺术理念。关于《棋王》的叙事建构,阿城特别强调:“小说中存在着两个世界:王一生代表的客观世界与‘我’代表的主观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小说结尾完成了相互参照”。^[5]这种双重世界的

叙事建构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更创造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结构美感。第一人称叙事在阿城作品中的运用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表达其独特生命体验的内在需求,最终实现了艺术表达的完满效果。

3 阿城小说的象征体系建构

3.1 《棋王》的生存哲学与精神象征

从象征诗学的维度解读《棋王》,王一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隐喻性。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王一生迥异于同时期知青文学中常见的革命青年形象。阿城在叙事中有意淡化文革的时代背景,简化故事情节,而将叙事焦点集中于王一生形象的特征强化。这一人物最突出的特质体现在双重饥饿状态:既是对食物的生理渴求,更是对精神滋养的迫切需求。小说通过细腻的饮食描写展现其生存困境:小说中写道:“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支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6]这种近乎病态的进食方式折射出极度的物质匮乏。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一生对象棋的痴迷恰恰反衬出精神世界的荒芜。母亲“先说吃,再说下棋”的告诫,道出了特殊年代普通人生存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尖锐矛盾。阿城通过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文革对青年一代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摧残。

然而王一生的象征意义不止于此。阿城在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对理想人格的期待:身处乱世而保持操守,物质贫乏而精神丰盈。其对象棋的纯粹热爱超越了功利目的,“为棋不为生”的执着展现了超凡的精神境界。通过“九局连环”的巅峰对决,王一生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阿城借此表达了对当代青年的期许: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困顿中追求精神的超越。

3.2 《树王》的生态意识与生命象征

《树王》中的肖疙瘩形象构建了一个极具深度的生态象征体系,这一体系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丰富的意蕴。首先,在自然生态层面,肖疙瘩作为护林人与“树王”

之间建立了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保护与被保护,而是达到了庄子所谓“物我合一”的境界。小说中描写肖疙瘩“粗糙的手掌抚过树皮的纹路,仿佛在阅读一部古老的生命典籍”^[7],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感。其次,在文化生态层面,当知青李立以“破除迷信”的现代性话语砍伐神树时,实际上构成了一场文化暴力。李立宣称“只要树王一倒,一种观念就被破除了”,暴露出启蒙理性对地方性知识的粗暴否定。肖疙瘩的坚守不仅是对具体树木的保护,更是对一整套生态智慧的捍卫。阿城通过这一冲突,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生态文化的脆弱性。第三,在精神生态层面,肖疙瘩四天四夜的守护行为具有仪式化的象征意义。“他像一尊雕塑般伫立,目光穿透飞舞的木屑,直达树心”^[8],这种描写赋予其行为以宗教般的虔诚。这一叙事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生态破坏的控诉,也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叩问。

肖疙瘩的形象集中体现了阿城的深层生态学思考。他反对的“以有用之树换有用之树”的功利逻辑,实际上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阿城的笔下,树王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更承载着生命的神圣性。肖疙瘩的悲剧性结局暗示着:当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结断裂时,人类也将失去存在的根基。这一象征体系在当代生态批评视野中具有特殊意义。阿城通过肖疙瘩与树王的命运共同体,预见了后来生态批评理论强调的“生命之网”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树王》不仅是一部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更是一部具有超前意识的生态寓言。

3.3 《孩子王》的文化隐喻与教育象征

《孩子王》通过教育场域这一微观视角,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象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作为教师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悖论性:表面上对教师身份的疏离与内里对教育本质的坚守形成鲜明对比。阿城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笔触,细致描摹了“文革”时期的教育生态——“教室的土墙斑驳脱落,阳光从茅草屋顶的缝隙中斜射进来,在坑洼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9]“字典”作为核心意象,在小说中经历了从实用工具到精神图腾的升华过程。当“我”将字典交给王福时,“这个瘦小的孩子用皴裂的双手接过,仿佛捧着一件圣物”^[10]。这一场景具有强烈的仪式感,暗示着文化火种的传递。在这个意义上,字典象征着被压抑时代中不灭的文化基因。

“孩子王”这一称谓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

在表层叙事中,它指代着教师在学生中的权威地位;但在深层象征中,它暗示着文化传承者的使命与困境。阿城通过这一形象展现了一个文化守夜人的复杂心态:既要面对体制的规训,又要坚守教育的本真。小说最终通过对教育场景的解构,完成了对文化重建的呼唤。阿城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我”的离去和王福的坚守,暗示文化传承的多种可能。这种开放式的结局,体现了阿城对文化复兴的辩证思考:真正的文化重建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批判性继承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4 结语

阿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三王”系列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这一系列作品既展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阿城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将对于人生、历史、宇宙及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融入文本之中,使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层面,呈现出哲理小说的特质。这种独特的创作取向,使得“三王”系列小说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 [2]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 [3] [美]丁施叔青:《与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
- [4]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 [5] [美]丁施叔青:《与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
- [6] 阿城:《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07期.
- [7] 阿城:《树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 [8] 阿城:《树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 [9] 阿城:《孩子王》,《收获》1985年第3期,第45页.
- [10] 阿城:《孩子王》,《收获》1985年第3期,第78页.

作者简介:刘瑞雪(2001年—),女,汉族,陕西咸阳,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